

宁夏英烈故事

张月英：舍身守护党的机密

岁月流转，山河铭记。在陕甘宁三省区交界的甘肃环县，巾帼英烈张月英的事迹历经岁月洗礼，始终被当地百姓久久传颂，成为陇东革命热土上不朽的红色丰碑。

苦难塑初心 投身革命洪流

1909年，张月英出生于宁夏豫旺（今同心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依靠父亲给地主打长工维持生计，常年饥寒交迫、度日维艰。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底层苦难，让她自幼深谙百姓疾苦，在心中埋下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

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盐池、豫旺等地，革命曙光照亮了西北大地。心怀赤诚的张月英毅然携手丈夫苏明投身革命，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积极的工作表现，她迅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陇东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妇女骨干，自此踏上了为国民党的革命征程，与丈夫并肩坚守革命一线。

勇担巾帼责 首任妇联主任

1937年4月，陕甘宁省委调整区划，合并组建定环县并成立苏维埃政府，张月英受命担任县妇联主任。七七事变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政府改制为抗日民主政府，推行民主选举，定环县更名环县。工作实绩突出、深得群众认可的张月英，连任环县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后又当选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肩负起边区妇女解放与动员的重要使命。

彼时的环县地处黄土高原偏远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封建礼教束缚、国民党势力打压、土匪横行作乱，新生革命政权建设阻力重重，妇女工作更是举步维艰。当地妇女深受封建思想禁锢和匪患困扰，普遍胆小封闭，畏惧干部、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为工作开展带来极大阻碍。

遵照边区党委妇女工作部署，张月英

全身心投入基层工作。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她常年走乡串户、深入田间炕头，以拉家常的方式，结合自身苦难经历，向广大妇女宣讲党的政策、新旧政权的根本区别。她待人真诚、体恤民情，慢慢打消了妇女们的顾虑，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成为当地妇女最信赖的贴心人、主心骨。

革命时期驻地不固定，县机关常年辗转多地办公，条件艰苦、居无定所，但张月英从未叫苦退缩。机关迁至何处，她便第一时间扎根当地开展工作，随后深入各区各村驻点走访，常常一去就是十余天。她与群众同吃同住、倾心交流，大力宣扬男女平等思想，激励妇女冲破世俗偏见，主动参与革命、保家卫国。

破除封建桎梏 引领妇女解放

为进一步破除封建枷锁，推动妇女真正翻身解放，张月英积极发起剪发、放脚运动。她耐心向群众宣讲，发髻、裹脚是束缚妇女身心的封建枷锁，不仅摧残身体、带来病痛，更禁锢思想、阻碍自立。在她的积极动员和正向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勇敢挣脱封建束缚，剪长发、放开裹脚，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主动参与边区集会、春耕生产、抗日支前等各项工作，成长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巾帼力量。

1938年春耕时节，陇东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县委书记刘昌汉赴延安开会，临行前将妇女工作全权托付给张月英。得知书记妻子马秀兰独自居家心生孤寂、心存顾虑，张月英即便公务繁忙、兼顾家务，仍坚持深夜上门陪伴宽慰。她鼓励马秀兰坚守革命初心、勇于担当作为，叮嘱妇女同志们主动扛起革命责任，男女同心坚守岗位、

守护新生政权，句句暖言坚定了战友的革命信念。

舍身护机密 热血铸忠魂

1938年4月12日深夜，万籁俱寂，百姓与干部均已入眠。环县匪首赵老五探知县委主要负责人外出、机关防备空虚，随即派遣150余名匪徒，连夜突袭河湾湾县党政机关驻地。匪徒凭借内奸接应抢占据点，发起猛烈进攻，刺耳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县保安队奋力反击，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危急关头，张月英心系战友安危，第一时间背起马秀兰奋力突围。成功脱离险境后，得知重要文件包遗落屋内，她毅然决然：“党的文件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她迅速藏好战友，不顾生死孤身折返险境。

在她找到文件准备撤离时，冲入院内的匪徒疯狂扫射，张月英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后续红军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成功击退土匪、稳住局势。战友们发现，牺牲的张月英仍紧紧怀抱文件包，以生命守护了党的机密，践行了革命初心。

英魂永留存 千秋传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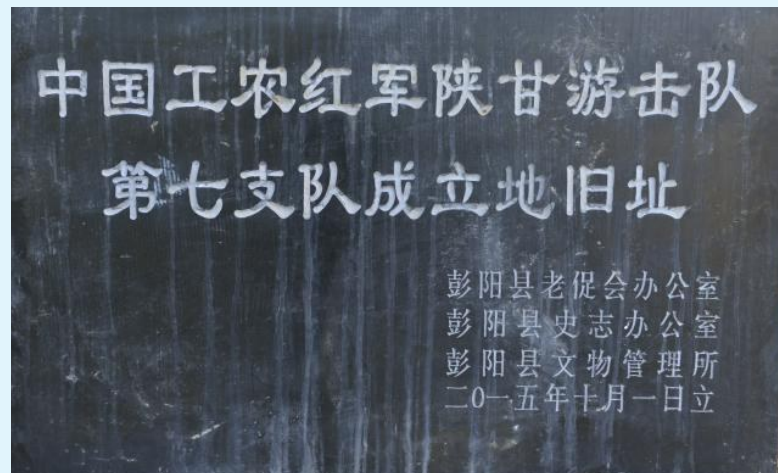
张月英壮烈牺牲的噩耗传遍环县，无数妇女为失去这位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失声痛哭。全县干部群众自发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深切缅怀这位舍生取义的革命烈士。

巾帼赴大义，热血照山河。张月英用一生践行信仰、守护群众、捍卫革命事业。她敢为人先、坚韧奉献、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深深镌刻在陇东红色大地上，历经岁月洗礼，永远被后世铭记、代代传颂。

（据《宁夏革命英烈》）

蒿店兵变燃星火 红色支队启征程

——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成立地旧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成立地旧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以下简称第七支队）成立地旧址，位于彭阳县新集乡周庄村。1932年9月，“蒿店兵变”后，兵变部队到达今彭阳县周庄村成立了第七支队。第七支队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宁夏创建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2015年，彭阳县革命老区促进会、史志办公室、文物管理局在周庄村村委会院内立碑标识。

第七支队成立地旧址原为周庄村一个农户宅院，因年久失修，崖面坍塌，现只剩下几孔破旧的窑洞。

1932年，蒋介石拨给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800支德国造步枪、200支驳壳枪及一批弹药，拟于9月下旬运抵平凉。为把这批武器弹药从平凉安全运到兰州，邓宝珊派行署干部补习队（下设军官队和军士队）260名官兵到平凉接运。中共陕西省委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夺取这批武器弹药，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实力。经研究决定，由李良（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

委）、周志学、李华峰（补习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等人完成此项任务。9月28日晚，补习队从平凉接到枪支弹药抵达蒿店镇（今属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宿营。李良、李华峰等在蒿店发动兵变，带领军事队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34人携45支枪撤上太白山。

9月29日凌晨，兵变部队到达周家庄（今彭阳县新集乡周庄村），脱离危险境地后，即召开会议。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峰任队长，李良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班。李良、李华峰分别作了简短讲话，阐明了兵变和成立第七支队的意义；制定了经城阳、镇原、庆阳到宁县的查克原，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的计划；强调了部队的各项纪律和进入民族聚居区的注意事项。

在行军过程中，第七支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时，在街道

沿途刷写“各民族一律平等”“打倒土豪劣绅”“买卖公平，不吃穷人”等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和宣传小册子，消除群众对红军的戒备和畏惧心理。10月1日是石家沟口（今彭阳县新集乡沟口村）集日，第七支队在石家沟口集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批斗了当地一名地主，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行至镇原境内宿营时，部队被当地国民党民团300余人围堵在一孔窑洞里，指战员们英勇奋力拼杀，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较多，加上行军过程中部分人员失散，最后第七支队只剩李良、李华峰、窦文德、武世英、苏士杰5名中共党员。他们无法按原计划前往陕北，只能一路南下经泾川回到平凉城郊，后被中共陇东军特委解救。李华峰、窦文德、武世英、苏士杰根据组织安排到关中开展游击战。李良回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受命到陕南筹建红二十九军。（据宁夏党史教育）

《新中华报》对陕甘宁边区妇女形象的塑造(下)

努力生产的女劳模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抗日军队急需扩充大量的战斗人员，大批的男子参军入伍，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抵抗日寇，而后方生产发展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妇女身上。陕甘宁边区妇女响应政府的号召，投入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当中，从传统家庭的“依附者”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建设者”，为边区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热情投身农业生产。前线和后方的粮食供给是坚持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本保障。由于边区劳动力的短缺，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春耕、秋收运动，保障粮食顺利产出成为这一时期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边区政府为了帮助妇女们学习耕种技能，在各乡成立妇女学习生产小组、劳动互助小组，妇联下设生产委员会，经常给以指导。在生产运动的推动下，边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的生产竞赛活动，并

创造出许多女劳动模范。《新中华报》对边区生产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女劳模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宣传报道。例如，张有英、贺得贤和李季凤的母亲等五位女劳动英雄除了在家“做饭”“养猪”，还每天按时“送饭”“驮水”到地里去，并主动承担了“牧羊”的任务，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行动，影响和推动了她们附近区域的妇女们也大批地自动地帮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参加春耕劳动；志丹县的一个妇女每天上山开荒耕地，自己开垦了三四亩地；甘泉县第二区一位52岁姓杨的老婆婆在春耕运动中，虽然她家中没有一头牛，但是“用自己的力去换取别人的牛力”，前后共计种了十八亩地。对此，陕北歌谣中唱道“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

积极参加纺织运动。边区布匹、棉花等生活物资极度短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妇女

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展了纺织生产运动。其中，边区建设厅用合作社方式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发展纺织工业，并指示延安等八县组织棉毛纺织生产合作社115所，而延长县则成立纺织生产合作社，并积极组织妇女纺织组，进行纺织。在这样的动员和组织之下，1944年边区参加纺织的妇女总数约15万人，纺纱量高达1660203斤，织成大布114497匹，基本满足了边区的布匹需求。

为了动员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中央妇委会专门指导举办“三八”节展览会，展示边区妇女们在各个生产劳动战线上取得的突出成绩。1941年3月16日，《新中华报》介绍了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三八”节展览会的基本情况。大会展览品内容甚为丰富，其中专设“妇女生产的成绩”部分，用以展览妇女的工业成绩，如纺毛织衣，边区难民工厂妇女生产的布匹和鞋袜等。

参政议政的女主人

传统社会的妇女地位低下，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给予陕甘宁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项权利，使得她们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担任政府各部门职务，参与边区的各项工作。

给予参政议政权利。边区政府实行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度，“女子不要多嘴”和“女子不要多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1937年5月23日，《新中华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第四条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1939年修订为十八岁），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直接使法律上确立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边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边区政府与各级妇联会的呼吁下，妇女们积极参与选举运动，从而走上管理各项政治事务的岗位。例如，神府县有女乡长负责乡政府的具体工作，延安县三区乡也

有数名女乡长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女干部是延安直隶东一区女区长刘生云，她身残志坚，努力学习，在负责东一区的妇女、民政和生产等各项工作中，受到当地民众一致好评，被“东一区群众选为区长”。她不仅是“农妇中的杰出者”，更是“延安县模范区的女区长”。这些鲜活的例子表明女性和男子一样具备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从而带动更多的边区妇女参与政府事务。

建立健全妇女组织。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顺利召开，宣告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它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标志着边区乃至全国的妇女运动有了新的统一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出席大会并题词道：“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1939年3月6日，《新中华报》刊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

工作的决定》中要求“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在中共中央与边区妇联会的统一指导下，各县、区、乡和村成立了相应的妇女联合会、妇女救国会和妇女代表会，并积极动员当地妇女加入所属的妇女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边区加入妇联会的妇女总数约达27万人。此外，边区妇女几乎在各乡各村都有女自卫军、慰劳队、识字小组等组织。各级妇女组织的不断成立和完善，使得边区妇女有了学习进步、参与政府事务的重要平台。

综上所述，《新中华报》精准定位党报政治属性，积极宣传党的妇女政策，从多方面展示了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新形象、新面貌和新身份，这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妇女抗战动员起到了积极影响。（据《团结报》）

